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

长征记忆

李润波◎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长征记忆

李润波◎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征记忆/李润波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 - 7 - 218 - 11319 - 7

I. ①长… II. ①李… III. 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
IV. ①K264. 4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0695 号

Changzheng Ji yi

长征记忆

李润波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 肖风华

责任编辑: 赵世平

封面设计: WONDERLAND Book design
仙墨 QQ:344581934

责任技编: 周 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400 千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 - 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序 言

值此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著名收藏家李润波同志的《长征记忆》就要与广大读者见面了。李润波同志邀我为该书作序。作为长期研究红军长征历史的工作者，打开该书，倍感震撼，深深地被这部书所吸引，欣然同意写几句话，权且作为序。

三十多年来，李润波同志不仅收藏了清代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老报刊5000多种、10万余件，而且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国家级报刊和专业报刊上发表众多学术探讨、收藏鉴赏、党史研究等方面的文章。

报刊是记录历史的重要工具。李润波同志利用自己30多年来收藏的老报刊编辑出版《长征记忆》一书，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是个创造，可喜可贺。他利用自己多年来收藏的老报刊和当年国内外出版发行的有关书籍，并参考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老一辈革命家，以及曾经参加围追堵截红军长征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撰写的回忆文章，编著本书，以全新的视角向读者展示了红军长征的风貌，很有创意。特别是该书收集了红军长征期间国民党新闻报刊的报道资料，美、英、日、俄等国家出版的专题，反映中国红军长征方面的书籍，是目前不多见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长征记忆》一书，从四个方面反映了红军长征的实况：

第一方面，李润波同志利用自己多年珍藏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等当时形成的历史文献，构成全书的基本框架，并以当年出版发行的报刊资料和20世纪80年代内部发行的《中共党史研究资料》为主要依据，并采取链接的方式，重点介绍与红军长征有直接关联的人物生平、历史事件，生动形象地反映了红军长征是20世纪30年代震撼世界的伟大历史事件；

长征记忆

第二方面，利用国民党当年出版发行的报刊资料，特别是1959年第一批特赦释放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受周恩来总理的嘱托，在“文化大革命”前撰写的有关红军长征期间如何围追堵截红军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大都在“文化大革命”前，发表在全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或地方省市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选编》等，以亲历者身份比较真实地见证了伟大的长征；

第三方面，利用民国当时新闻媒体出版发行的老报刊，诸如：《大公报》、《时事新报》、《国闻周报》、《亚洲民报》、《世界日报》、《世界晚报》、上海《晨报》、《北平晨报》、《申报年鉴》等，从中摘选有关国民党军对红军长征围追堵截的报道资料，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人类历史上的真实长征；

第四方面，李润波同志利用自己馆藏的自1936年到1941年间，外国记者来华采访和情报机构在华密探撰写的外文书刊资料，诸如：美国在1935年出版的《剿共前线》、1936年出版的《中国红军在前进》、1937年出版的《生活》周刊、《亚洲》周刊、《西行漫记》，苏联在1938年出版的《红军长征记》、《中国苏维埃》，日本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的红色星星》、《赤色支那》、1941年出版的《赤色支那内幕》等，从多视角、多侧面反映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

由此可见，李润波同志新作《长征记忆》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值此机会，我愿意向大家推荐，也相信大家会从中获益匪浅。

徐占友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2016年6月11日



第一章

红军长征的有关背景

第一节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 / 2

第二节 毛泽东遭受排挤 / 7

第三节 李德来苏区 / 12

第四节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 14

第二章

红一方面军长征

第一节 决策西征 / 26

第二节 突破封锁线 / 32

第三节 血染湘江 / 37

第四节 黎平改道 / 55

第五节 飞渡天险乌江 / 59

第六节 遵义会议 / 62

第七节 四渡赤水 / 79

- 第八节 渡过险关 / 90
- 第九节 几张报纸定乾坤 / 117
- 第十节 吴起镇 / 120
- 第十一节 直罗镇战役 / 124

第三章

红二方面军长征

- 第一节 红二方面军的组建 / 147
- 第二节 英勇的红六军团 / 148
- 第三节 红二方面军的发展 / 160
- 第四节 孤军奋战突重围 / 165
- 第五节 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北上 / 174

第四章

红四方面军长征

- 第一节 红四方面军的创建 / 191
- 第二节 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 / 193
- 第三节 强渡嘉陵江 / 201
- 第四节 张国焘分裂中央 / 207
- 第五节 会师陕甘苏区 / 215

第五章

红二十五军长征

- 第一节 出师北上 / 221
- 第二节 粉碎第一次“围剿”，创建陕南根据地 / 228
- 第三节 智取紫荆关，粉碎第二次“围剿” / 234
- 第四节 到达永坪镇，胜利完成长征 / 237
- 第五节 红七十四师归队 / 241

第六章

大会师

- 第一节 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 246
- 第二节 中共中央立足陕北 / 257

第七章

有关长征的珍贵文献 / 267

附 录 / 281

后 记 / 318

第一章

红军长征的有关背景

长征
记忆
Chang Zheng Ji Yi



第一节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瑞金建立的中央政权机构，也是建立人民政权的探索和尝试，对各根据地、各部红军的管理具有中枢指挥功能。

建立红色政权，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自从1927年中国工农红军建立之后，就需要有较为稳定的根据地来保障红军生存，因而，在1928年到1930年间，中共在江南几个省的边境山区建立了很多小的根据地，其中比较大的就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在1928年撰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中一再陈述：“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这种情况的发生有其特定历史条件，但红色根据地太分散，不仅给施政带来很多困难，也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于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苏区，成为迫切需要。为达到这一目的，1930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通告，首次提出建立全国苏维埃中央政权以统一领导全国各地苏维埃区域斗争构想，并开始着手筹备成立苏维埃政权事宜。

1930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这两次会议的召开，对沟通全国苏维埃区域和红军的联系，动员苏区军民投入建立苏维埃全国政权的斗争，起到了促进作用。9

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正式成立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并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条例，以及准备提交大会的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经济政策和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等草案，决定把“一苏大”的会址放在红一方面军活动的江西苏区。11月，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向各苏区发布召开“一苏大”通知。

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南都成立，后迁瑞金叶坪。受中共中央委托，苏区中央局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承担了选举与会代表、酝酿确定苏维埃中央政府组成人员名单、起草文件、制定法规、确定具体会址和会期等筹备工作。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候选人，报告共产国际后得到批准。毛泽东、任弼时、项英等负责筹备工作的组织领导。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牵头筹办“一苏大”会务和各项庆祝活动事宜。6月，苏区中央局决定11月7日召开“一苏大”大会。10月，这个决定得到党中央批准。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有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苏区、赣东北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琼崖苏区等苏区的代表以及红军、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工会等代表共610人。越南、朝鲜也应邀派来宾出席大会。项英主持大会。大会推举项英、张鼎丞、陈正人、周以栗、朱德、曾山、邓广仁七人组成主席团。

大会通过周恩来在上海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确定这个新型的国家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的”。

项英在庆祝大会上，向大家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定都瑞金，改瑞金为“瑞京”。

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法律文件。大会选举产生了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等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最高政权机关；设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

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从此，一个崭新的红色国家政权在世界东方诞生。

1931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未到职）任副主席。同时，会议产生了中央政府的各部人民委员。从此，瑞金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心脏和枢纽。

1931年12月1日，以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共同署名发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号布告》，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业已宣告成立，从今日起，中华领土之内，已经有两个绝对不同的国家。一个是所谓的中华民国，它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军阀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用以压迫工农兵士劳动群众的国家，蒋介石、汪精卫等为首的国民政府，就是这个国家的反革命政权机关。一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国家，它的旗帜是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地主阶级，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建立苏维埃政府于全中国，为数万万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兵士及其他被压迫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为全国真正的和平统一而奋斗。它的基础，是建筑在苏区和非苏区几万万被压迫被剥削的兵士工人、农民贫民群众的愿望和拥护之上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体制由全国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人民委员会、最高法院、审计委员会等部分组成。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政权机关。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选举主席团为最高权力机关。人民委员会则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最高法院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司法机关。

中央政府之下，设九部一局。部长称“人民委员”：

外交人民委员 王稼祥

军事人民委员 朱德

劳动人民委员 项英
 财政人民委员 邓子恢
 土地人民委员 张鼎丞
 教育人民委员 瞿秋白（在上海）
 内务人民委员 周以栗
 司法人民委员 张国焘
 工农检察人民委员 何叔衡
 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邓发

1931年12月11日，创办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

新的政府行政宗旨一方面是冲破国民党军“围剿”，努力发展根据地，一方面就是举起抗日大旗。有些读者乃至学者不了解历史真相，误以为红军建立苏区甚至于后来进行长征就是为保存力量，与国民党政府争夺地盘，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不过是个幌子，其实奋起抗日一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一个重要目标，这一点不容置疑。

《红色中华》创刊号头版下方就刊文揭露日本侵华阴谋，题目是《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加紧》；二版刊登一篇《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揭露日、法、英等国企图瓜分中国东北阴谋。而且以《反帝运动高涨》为题，报道各地大学生

《红色中华》创刊号刊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号布告



组团到南京政府请愿，要求政府出兵东北，抗击日寇的消息。

临时中央政府于1932年4月26日发出对日宣战通电，宣告它将“领导工农红军和全国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实行瓜分中国，以求得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

第二节 毛泽东遭受排挤

1931年初，王明进入最高领导层，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为这一时期王明最信任的主要成员，称“三人团”。这三个人组织纪律性很强，不折不扣地执行领导交派的各项任务。王明的很多想法，都是通过“三人团”实施的。

1931年4月，“三人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时执掌苏区中央局大权的是项英。1930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周恩来担任书记。可当时周恩来在上海负责中共中央日常工作而无法分身，书记一职便由先期到达江西苏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代理。而王明是因反六届三中全会才上台的，所以，由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派去的项英就遭到王明新派来的“三人团”排斥。在中央苏区享有很高威望的毛泽东这时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和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委。虽说王明、博古并不太愿意与毛泽东打交道，但慑于他在红军、群众中的声望，还不想得罪他，甚至还想拉拢他，利用他的声望，为其推行“左”的一套方针、政策出力。

1931年5月，项英被撤销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由毛泽东代理。6月2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项英的主席职务改由毛泽东担任，朱德、项英任副主席。毛泽东一时成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加上他成功地领导红军粉碎了蒋介石组织的两次对中央革命根据

地的反革命“围剿”，声望大增。

王明最初打算排斥项英，拉拢毛泽东，但他很快发觉，毛泽东有一整套自己的路线和见解，很难拉近。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王明完全控制了中共中央，此时的他急欲掌握中央苏区的领导权，他意识到必须尽快拿下毛泽东，既然拉不动就采取制服的办法，不然刚到手的领导权就有丢失的危险。于是，他指派“三人团”，利用“赣南会议”机会对毛泽东下手。在1931年9月举行的“赣南会议”上，“三人团”按照王明指示，突然对毛泽东展开批判，在“一苏大”前夕，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改由项英担任。正因为这样，“一苏大”由项英主持，并任主席团主席。至于毛泽东，后来仍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全然由于他在红军、在苏区广泛的影响，由于他领导三次反“围剿”连连取胜而赢得的声望。

1931年9月下旬，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6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3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24岁的博古负总的责任。全苏“一大”前夕，即1931年10月，中央政治局决定，王明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中央政治局同时决定，周恩来赴中央苏区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王明在离沪赴苏之前，为消除推行“左”的一套的阻力，多次给中央苏区发电报，目的是把他那一套强加给中央苏区。其中最具危害的是《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对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批评。10月，王明又以中央名义发来电报，批评毛泽东：“苏区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

1932年5月20日，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发来一封指示电，称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完全错误的。“泽东及其他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们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不能扩大和巩固苏区”，“是当前极大的危险”，“是过分估计与夸大敌人力量，是纯粹防御路线”，是“红军中游击主义的坏的残留”。电报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要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毛泽东“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使他在红军及群众中宣传

进攻路线，争取党和红军说服他的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危险，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

这份电报清楚地表明了临时中央错误估计了敌我力量，盲从共产国际指令。他们不了解根据地的实际情况，乐观地估计革命形势，主张进攻中心城市，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在和敌人对垒时，主张硬碰硬，“先发制人”。

毛泽东基于对革命形势的正确估计，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主张在蒋介石统治薄弱的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两军对垒时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必要时放弃阵地，实行退却，重在保持、发展红军的有生力量。这一套灵活的战术，自然不能为王明、博古等所接受，并被一再指责为右倾，而遭到批判。

但毛泽东不为所动，他相信自己的判断，更信服经过实践反复验证得出的结论。这样，毛泽东与王明临时中央之间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场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结果可想而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解除毛泽东对军队的指挥权；命令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亦简称中革军委）主席团，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取消原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机构；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也被免去，复由项英担任。调毛泽东担任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即国家主席）和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即国家总理）。

链接：一部电台成了惩治毛泽东的工具

第一次反“围剿”前，中央苏区没有电台，苏区和中央的联系全靠交通员，来回一趟至少要半年的时间。第一次反“围剿”缴获了张辉瓒的半部电台和谭道源的一部电台，但功率只有15瓦，无法和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联系。1930年第二次反“围剿”时，红军缴获了公秉藩的100瓦大电台。东固战前，毛泽东就从监听中知道这部电台功率大、信号强，嘱咐部队务必完整地要把电台缴过来。红军指战员遵照命令，把这部大电台连人带机器缴了过来。这时周恩来从上海派来的机要干部伍云甫、曾三等人已到中央苏区，毛